

编者按：

2013年8月26日至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承办的首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围绕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形成了若干富有学术洞察力的见解和共识。^①

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内容及方法探讨

乌丙安 等

[关键词] 都市民俗学；传统民俗；城市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K890;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4)04-0045-06

民俗学是一门现代之学，但长期以来一直将研究对象限于传统民俗，忽视现代。而相应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使我们的视野一直局限于乡土社会，对都市民俗视而不见。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飞速进行，乡村社会日益缩减，而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流模式，都市民俗学应运而生。中国的都市民俗学起步较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进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一、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移民热潮，传统的民俗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加剧，这一社会文化的变化，引起了英美等国民俗学者对民俗在文化认同和文化同化中重要作用的关注和思考，20世纪60年代都市民俗学逐渐在英美等国兴起。都市民俗学的兴起，不仅是研究领域由乡村到都市的转移，也是民俗学顺应现代化潮流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仲富兰（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都市与乡村一样，都是民俗研习的田野。快速的城市化，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投注于城市空间。民俗的主体是人，不论是老居民还是新移民，他们都在城市空间里劳作与互动，互动的结果，不仅扩展了都市民俗新形态，更使都市民俗学的人文精神得到了提升。世态复杂、人口嘈杂、社区庞杂、行业驳杂，特别需要民俗学者将目光关注到都市民俗学的课题中来。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城市是人类未来的主要居所。人类告别洞穴生活是一次飞跃，进入狩猎游牧与农耕时代，揭开文明灿烂的篇章，但是，城市却最终成为人类的主流栖息空间，这是世界大势。中国民俗学诞生于传统的农耕时代，最终也必然将走向城市民俗研究的道路。

^①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研究生程鹏根据录音整理、编辑而成。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元明曼、苏长鸿、李雯、韦明杏、吴雯婷、沙媛媛、欧阳丽婷、张利峰等同学参与了论坛录音整理。

从2010年以后,我们已经有50%以上的地区进入城市社会,现在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人口老龄化进入高峰时期的速度可能将加快,农村将大幅度的萎缩、减少,而城市将有很大的发展。城市社会如何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城市民众如何建立自我认同,城市民俗产业如何得到健康发展,同时如何安顿我们的人心,如何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面对这些问题,都市民俗学任重而道远。

蔡丰明(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大量的人群集聚在乡村到大量的人群向城市转移,这个人群中的社会基础就决定了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大量人口的生活方式改变,居住地发生改变,文化生态也随之改变,所以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也要因此而改变。当然,现在有很多乡村民俗现象依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是我们要抽出足够的精力来研究都市民俗学,而且这个领域我们几乎和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英国也好,他们的都市民俗学不会比我们早多少,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所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可以说为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研究都市民俗学非常有意义。

耿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民俗学怎样来确定它的学科地位,怎样走出一条新的学科发展道路,真的是不能逗留于传统的民俗研究的范畴。我们对农业民俗的研究是最好下手的、资料最多的,也是在我们文化认知里头最真实的东西。然而,我们在丰富的民俗资料海洋里头顺手一捏就能拿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资料或者是民俗事象来做分析。中国民俗学真正的新的活力在于都市民俗学,在于完全不同于传统民俗在城市的延续,而是完全来自新的都市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民俗现象。这些民俗现象有人的情感,有一种日常生活的逻辑在里面。我们知道现代都市民俗学不会再像传统民俗学那样,它的支架是有固定的据点,比如说它有空间的固定性、有时间的固定性、有人群的固定性。这是现代都市新民俗研究最困难的一点,所以大家都不去碰这一块,但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困惑。为什么会有都市传说,为什么大家会建构来自城市的新的传说。我觉得中国民俗学对这一块的回避,没有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就没有办法带来新的建构。因此这个学科的成熟需要更多从都市民俗学对都市生活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二、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内容

早期的都市民俗学仅仅是将研究对象从乡村扩展到都市,作为区域民俗学的一类而与乡村民俗学相对应,在理论方法上,并没有多少创新。然而,随着乡村日益都市化,乡村与都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现代化、多媒体、网络等对都市和乡村都有影响,此时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都市这一区域的范围,研究对象也由关注传统民俗转为更加贴近当代社会生活,此时的都市民俗学是取空间上的都市化与时间上的现代化的交集,不仅对传承于都市空间范围的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也关注在都市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民俗事象和新问题。

耿敬:我觉得都市民俗学的落点在于都市的概念上。都市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各大古城,它脱离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但没有脱离农业社会结构。另外一种是社会工业化以来建立的新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转型之后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

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应该面对我们新的生活。美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有很多东西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比如说他们做一个行业的研究,做一个新的现代城市的基督教的教堂内部歌曲的变化的研究,做关于地铁中人们唱歌习惯的一个研究。这些研究都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其实这些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国提倡民俗新式改革后,传统民俗作为一个历史学的附属就开始走向对现代生活的关注,在这样的变化中民俗学的研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民俗学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的历史学或者对历史重构意义上的民俗传播的话,这个学科是要死掉的。

陈志勤（上海大学副教授）：日本都市民俗学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陷于停滞，后来他们的研究还是回去找传统，一个原因是没有开拓出新的研究方法。另外就是发现都市民俗都是从乡村里带过来的，所以就无所谓都市民俗，无所谓乡村民俗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俗本身的概念有了改变，有了新的内涵。民俗学以前研究农村遗留物、过去的事情，但是后来民俗它可以研究农村，也可以研究城市，它可以研究过去也可以研究现在，包括未来，所以也就无所谓说都市民俗、城市民俗或者说乡村民俗。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民俗学界都不怎么说都市民俗，而是说都市的民俗。另外，都市的民俗又研究一些新的文化现象，这个领域如果我们不在意的话，我们就会脱离这个社会。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理解都市民俗，名称其实不重要，内涵更重要。日本所说的都市的民俗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都市化的民俗，我们今天应该和早期的都市民俗学有个告别了。我们现在开始发展的可以称作是后都市民俗学。

仲富兰：都市民俗学研究什么东西？还是要研究当下。上海的文化，包括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这样，一个是面，一个是里。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概貌，看看面是可以的，但想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这还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到这个里，要了解城市的里子。像东方明珠就是上海的面，那么里子在哪？里子就是弄堂，所以上海这个城市如果在高空在飞机上航拍就会看到，弄堂的小区把城市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隔成了很多小的通道，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那么几千万人就生活在这里。所以既要看到上海的面子、上海的体面，又要看到弄堂里生活的艰辛，交通的闭塞、环境的狭小、人口的密集。

弄堂它不仅是物质的，更是一种弄堂文化、人生的故事，反映了文化的变迁。尽管弄堂是物质的，但里面展现的东西是非物质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居住环境，才形成了上海人的性格特点。在上海的弄堂里，既有传统的文化，但同时又较早地实现了个性解放，这两者是较好的融合了。上海这个地方是南宋建镇，元代置县，民国时建特别市，现代上海是一个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弄堂里的商业化也是非常的流行。在这样的商业氛围下，上海人比较讲求实惠而淡漠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上海人重视读书，读书会 and 仕途产生联系，上海人也很重视主顾，你做老板，我来给你打工赚一些钱。还有就是，上海人很会把政治的东西转化成商业的，他们不关心政治，但可以把它拿来赚钱。所以啊，长期以来形成了上海人追求合理化，规范平等的制度，这为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政治制度起到了借鉴作用。

蔡丰明：民俗文化对于构筑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作为整个国家文化的保护计划，但是我们比较多的还是从乡村社会这样一个背景下来探讨民俗文化，而从城市语境中来探讨还是比较缺位的。现在谈到的城市民俗文化的保护我感觉有三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是现代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先进形态，它需不需要民俗文化保护？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民俗也是值得保护的，那么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儿？它与乡村社会的保护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就是保护的路径问题，城市中如何进行民俗文化保护呢？它和乡村社会民俗文化保护的差异和不同点体现在哪里？这个就是一个保护路径问题。第三是面对现在城市化带来的大量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破坏，我们应该怎么进行保护？

对于城市民俗文化保护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延续城市文化传统，增强城市文化认同；第二我认为是构建城市的和谐生态环境，维护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第三就是塑造城市自身的文化形象，彰显城市鲜明的文化个性。在民俗文化价值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既要强调民俗的共同性，又要强调它的差异性，要强调它在城市特点中保护的独特价值问题。

那么现代城市在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有四个方面：第一，城市中的文化包容性强，它为各种民俗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二是科学技术先进，使得民俗文化的保护更加科学和有效；第三就是组织机制严密，而这套组织机制对于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与各种方法的实施是非常有利的；第四是文化理念新颖，它更能体现出民俗文化保护事业与方法的时代性与前沿性。

对于城市民俗文化保护的途径与方式，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种：

第一是最原始的记录性保护,即运用一些科学的方式与手段(如笔记、照片、录音、摄像等),将存在于当地的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别是濒临灭亡与失传的民俗文化遗产资源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其能够得以长久的保存与传承。记录性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资源普查、信息录入、名录编制、文献出版等等。

第二个叫做收藏性保护,就是通过某些收藏、存储的方式,将民俗文化中一部分有形物体置放到具有较好科技保护条件的场所——陈列馆与博物馆中进行保存。这种保护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使保护对象较少受到自然因素的侵害,延长保护对象的保护年限。除了静态保护,现在还提倡动态保护,采用虚拟博物馆与数字化交互式博物馆,这是博物馆的先进技术在民俗学保护中的应用,现在这个方面也做的比较好。

第三个叫做活动性保护,就是让需要保护的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继续活动与发展,寻求新的生机,使其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传承延续,以获得新的生命。

第四种就是生态性保护,就是将保护的不仅仅局限在保护主体对象本身,而是扩大到与保护主体对象有关的整个生活场景、生态环境,将与保护主体对象有关的整个生活场景、生态环境一同完整地保护起来,以使保护对象更好地显示出一种文化的整体感与生命感,为保护对象的生存发展营造一种更好的生存空间。

在当前城市民俗文化保护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资源濒危、生态破坏、传承人缺乏、条件不足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第一就是要更新观念,城市发展要和历史结合,物态保护要和非物态保护结合,碎片保护要和整体保护结合,工程建设要和持续发展结合。这些理念我认为在当代城市建设和发展中都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加强立法。第三个是机制保障,要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两种机制的功能。城市民俗文化保护应该走一条与乡村民俗文化保护不同的道路。

孙正国(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都市化是一个多重层面的,政府、学者眼中有一个都市,民间也有一个都市,两种想象是有差异的。在都市传说中,一类是由原来乡土社会中的传说发生的都市化转变,例如关于闹鬼空间的“鬼载”传说,就是乡村传说都市化演变的一个例子,它不是真正意义上都市空间新造出来的传说。我们关于闹鬼空间的“鬼载”的记忆,一代一代地流传到城市,所以它造成大批的传说都市化,这类传说里关于鬼神的信仰不是体系化的,与乡村里体系化的鬼神信仰不同。另一类则是在都市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传说,如在地铁、高架这种真正的新的都市空间的建立过程中形成的传说,没有这个空间就没有这个传说了。那么这样一个真正的都市传说,事实上就是一个都市的神话了,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传说了,它为这个都市附上了一种民间的想象。这两类都市传说也可以说是民众对都市的两种想象路径,即传说的都市化与都市的传说化。

我们的现实是一个瞬间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认为它是一个过渡的生活空间。它既是习俗、传统、过去的一个交接点,也是未来空间的新生点,我认为在现实当中这两个空间两个世界的交汇,会出现那种交错的变化,尤其是今天都市以全新的生活方式出现的时候,民间的模糊的、那种错乱的、尴尬的,甚至是被挤压变形、扭曲的东西在我们人的生存空间中造成了很多困惑。一方面是对过去传统的那种肯定和坚信,另一方面,我们对未来世界是恐惧的,这两种肯定的和质疑的东西把它交织在一起就会形成那种怪异的想象。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我就讲两点,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现代性都市社会化的设计对原都市习俗的无情摧毁。大家都研究变化,民俗文化在变迁,在经历社会化的变迁,研究变迁必须研究为什么变、怎么变,要抓住变的要害。现代化的都市不是像我们习俗化那样是自然而然的、是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婚礼、葬礼都是传承下来的,而社会化的东西有很多是人为的,它可以设计未来。民俗自古以来是客观地传承的,是民众的逻辑,不能创造,也不需要设计。所以特别要记住,民俗学家不要到处给人出招,说我想出这么一个民俗,也不要轻易下结论说这个就是

新民俗，比如短信拜年，这个是新兴的，但不是新俗，是个形式，拜年的形式过去是讲究叩拜的，现在呢是发下短信，这个变化不是根本的民俗。所以现代化的都市，社会化的设计，无情地摧毁着习俗。生活在变化，很多习俗都在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无情地冲击摧毁的是什么东西。它可以冲击很多的硬件，如城镇化改造、平房变成楼房，出现很多的城中村，这一点对原有的文化意识是一种严重的挫伤。还有就是新区营造对原社区群体习俗的消解。上海滩里弄时期的习俗消解了多少？基本就没了。还有国家体制下大都市改造对社区习俗的关注和容纳的程度是多少？要调查。比如上海的玉佛寺，过去拆掉了，不允许你用，民间信仰都没有了，现在容纳到什么程度，容许过浴佛节，能过到什么程度，不超过什么样的范围。要去了解一个大城市的这些变化，先知道变化，再去找习俗。再就是影响深远的民俗文化空间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民俗文化空间主要是城市庙会、城市节日，抓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如何过节的，在家里面怎么过节，在公共空间怎么过节，很多农村的古老习俗在城市里面再过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希望年轻的学者们要多关注。城镇化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把古老的习俗、古老的节日和庙会逐渐地扩大化、夸大化或者向体制内引导，或者加工打造，你都要分析清楚。那些政府出来拿钱办的什么文化节等等，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古老的节日扩大了，使节日适应城市，这个是现在的趋势。什么是现代居民可以接受的？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要“还节于民”，政府不要劳民伤财，把钱给百姓，让百姓自己过年、过庙会。现在的莆田妈祖庙会就是莆田老百姓自己干的，政府不再出面了。体制内曾经遏制的那一时代，群众不敢用自己的民俗过日子，但今天宽松了，今天的容纳程度有了，她（民俗）就出来了。再就是要注意，原来的社群和个人对原习俗生态所抱的观念要做评估，看看变了没有。我们要领会我们这个国家体制内的宽松度，根据这个去评估一下，接着再做调查。总之，我们现在的都市民俗正在摸索，要注意动向，而不是急于做大文章，下大结论，时候没到。我们现在的关键是把握动态变迁的状况，这也是文化生态本身，这个文化生态要把握住，要不然错过这个历史时期，上海的很多东西解释不清楚。另外就是，在大城市里进行生态调查，千万不要把现代化的东西和传统完全对立起来，传统进入大城市以后，很快就和现代结合了。不用你张罗，居民自己会，不是我们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或是搞旅游的人去开发打造能解决的问题，是老百姓自己把它重新再造，这在民俗学上是规律。政府主导的民俗化管理向民众主体自理的逐步过渡是都市民俗复兴的关键。民俗的主宰者是民众，民众自己往前走，民众走到一个阶段自然而然知道该淘汰什么，你让他淘汰，他不舍得淘汰的，就会重新启动起来，而且有新的形式。这一切都必须由主体民众来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一拍脑瓜就改变了民俗，民俗就没有了，是不可能的。尊重民众的主体位置，老百姓的主体地位奠定以后，你跟群众结合起来，听听他们怎么想，他们下一步想怎么过，他们会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民间有那么些个真正的传承人，实实在在的传承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都在发挥作用，你不用国家奖励他叫代表性传承人。所以研究既要注意立足于民俗学，还要立足于尊重主体民众，这是推动民俗发展的根本之一。

三、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都市民俗学的兴起，不仅使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有了改变，也对民俗学既成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了重新考察的要求。日本民俗学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沉寂，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开拓出新的理论方法，用原有研究乡土社会的理论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在都市中出现的问题。因此，都市民俗学要站稳脚跟，对新的研究理论方法的探讨也就非常必要。

郑土有（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教授）：我们研究都市民俗文化不是一个大而空的空谈，而是要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去探讨都市民俗文化的形成、它的功能、它的价值等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切入点、一个具体的载体。居住空间是一个城市中非常具有特色的，或者说是包容性

的这样一种物理载体。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研究建筑，而是研究建筑以及居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人不是一个抽象体，人每天都要在房子里生活，所以我们通过研究上海的里弄，就可以研究上海的普通人每天的日常生活，这个是我们民俗学研究的范畴。还有从浦东的石库门建筑当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城市个性。因为这个城市的个性也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落实到每个人，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他的行为当中，才能提炼出一个城市的个性和一个城市的精神。从这样的一个细微的，或者是从生活中的柴米入手，来探究这些人的精神、生活，从这些人的精神生活中去探求一个城市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民俗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耿敬：对于现代化的民俗，它一方面面临着整个学术思维训练，一个就是实地调查的艰难。我们知道，采取一种传统的乡村农业的民俗方法去做调研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可以随便找一个事象，民俗学调研的时候喜欢研究事象，这样实地调查资料收集过程相对简单，所以我们容易做这个东西。当然更好的民俗研究是做过程的考察，而不是做节日的时间节点，今天是什么节日今天就去了，但是一个节日的准备可能要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如果对过程进行一个实地调查的话，那个实践会更好，能够切入这个民俗支架背后的逻辑体验。

郑土有：研究都市文学要考虑时空两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够笼统地讲一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段的问题在里面。都市不是只有一个类型的，而是有很多的类型，时间的不同、都市的类型不同，都市的传说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具体研究的时候是要考虑的。民间文学也好，民俗文学也好，实际上都是在讲我们现代哲学。但是我们在具体研究的时候往往都忽略了跟现代的、跟当下的结合。

我们现在研究都市传说经常借用布鲁范德的理论，那么布鲁范德的那一套理论在我们中国的都市传说研究当中，它的恰适度到底有多大，哪些理论是适合研究中国都市传说的，哪些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都市传说接不上关系的，我觉得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这个可能应该是作为一个重点来看，不能在我们研究某个问题时把布鲁范德的理论，他的那本书拿来作为一段证据，来证明他是正确的。实际上，他的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说得不对，他所讲述的背景可能和我们所讲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他的理论中所反映的东西和我们的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布鲁范德的理论对我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适用性，这方面我们要做一些分析，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研究当中确实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都市传说的时候，要考虑它真正的来源。有很多传说，它可能是某个人在网上编出来的，然后我们把它当宝贝，实际上，民间还不知道，或者说是在网络上流传，然后反馈到民间，可能民间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这个就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了。研究得轰轰烈烈，实际它只是由某个人编出来的。当然，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不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来源问题。如果是从网络上发现的，我们首先要从网络传播的角度去研究，而不能把从网络发生的当做民间发生的来研究。另外，影视剧本或者网络游戏企划案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薄弱的东西，在民间文学类的文化产业中，如何对传统民间故事进行再造？如何适应现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陈志勤：都市民俗学对个体的研究要突破外围的资料，用问题意识和前人的研究进行对话，你会发现许多需要去调查的东西。关注个体的体验，是对群体中的个体的关注，不要把它从主体中脱离开来。对于一些新兴民俗或者新趋势的研究，要突出一些地域性的反映，还有一些习俗的变化，都应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变迁过程呈现出一种趋势之后，就应该考虑一些东西，需要和整个人文学科已有的研究进行对话。

在现代化、都市化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正因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都市民俗学大有可为之处。中国的都市民俗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实践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责任编辑：刘 勍]